

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类生存环境恶化背景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辨析

海山

(内蒙古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本文通过考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历史发展演变, 提出通常所说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实际上是一个由绝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等两个理论观点构成的理论体系。绝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唯心主义的理论观点。而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 是地理学人地关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科学地位是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地理学获得健康发展的重要理论前提。

关键词: 人地关系; 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学;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K90

文献标识码: A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历史发展回顾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地关系理论发展历史上最古老、争论最激烈、影响最广泛的一个理论。几千年来, 地理环境决定论几度兴衰, 在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最早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在古代中国先秦和欧洲古希腊时期就有记载。欧洲中世纪神权统治时期, 地理环境决定论一度衰落。文艺复兴时期, 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摆脱神权统治的思想武器, 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德国广泛鼓吹, 20 世纪中叶以后, 地理环境决定论再度衰落。然而, 这一时期也是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日趋紧张时期。地理环境决定论蕴涵着人类几千年来关于人地关系实质问题认识的智慧积累, 深入研究挖掘其科学成分, 对于今天协调人地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以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解释人类社会现象, 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部分或全部现象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潮。有记载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萌芽最早出现于西方的古希腊和中国古代的先秦时期。古希腊哲学家希波格拉底(公元前 460—377 年)在其《论环境》一书中, 通过研究气候季节变化对人的肉体 and 心灵的影响, 得出了人的性格和智慧是由气候决定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 年)在其著作《政治学》一书中指出, 北方寒冷地区各民族性格是精力充沛、富于热忱, 但大都拙于技巧而缺少理解; 亚洲气候炎热, 各民族多擅长机巧, 深于理解, 但精神怯懦, 热忱不足, 故常屈从于人而成为臣民, 甚至沦为奴隶; 希腊在地理位置上因处于两大洲之间, 其秉性也兼有两者的品质。他们既有热忱, 也有理智, 精神健旺, 所以能永保自由, 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发展, 倘使各种性格一旦能够统一于一个政体, 他们也就能够统治世上其他民族了。^[1]显然, 古希腊这些哲学家所主张的是地理环境无条件的绝对的决定作用。

正如恩格斯所说: “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 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2], 在中国, 各种人地关系思想的胚胎也都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古代先秦著作《礼记·王制》中指出“广谷大川异制, 民生其间者异俗”; 《管子》中记有“沃土之民不材, 瘠土之民向义”。但这些古籍“都有保护山林川泽, 以时禁发, 保护生物资源的记载和论述。”^[3]可见, 地理环境决定论并非与地理悲观论或地理宿命论有必然联系。换句话说, 古代中国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中包含着积极的思想萌芽。然而, 《老子》中则指出: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庄子, 山

木》有记载：“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 这些论断，都带有环境决定论思想萌芽。而且这些思想里还都包含着地理悲观论或地理宿命论色彩。[4]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在古代中国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有“积极”与“消极”之分。

早在 2000 多年前，在西方和东方均出现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萌芽，一方面是由于人的狭隘的活动范围、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软弱无助以及人的认识能力水平低等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人对自然力的崇拜，从而把人类社会许多方面问题归因于神秘的自然地理环境。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没有太多“物质”的“中介”，而是一种直接、紧密的关系。因此，人类能够非常直观的了解人地关系。然而，这种“直观的了解”，可能更真实、更客观和更深刻。

经历天主教神权统治的漫长黑暗岁月之后，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作为反对唯神论的思想武器，地理环境决定论再度盛行。文艺复兴晚期法国学者让·博丹（1530—1596）认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 [5] 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 年）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而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热带地区气候炎热、身体疲惫，没有勇气，所以奴性重，通常为专制主义所笼罩。寒带人体质和精神能从事长久、艰苦、宏伟和勇敢的活动，保持政治自由所以欧洲多民主政体”。 [6] 显然，孟德斯鸠是继承了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除此之外，在欧洲 18—19 世纪的学术著作中，气候决定论、温度决定论、水决定论、位置决定论等思想观点也广泛流行。

工业革命以后，1859 年达尔文（1809—1882 年）在其巨著《物种起源》中提出“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等概念，阐明生物进化和生物与其环境统一的观点，不仅引起生命科学的革命，而且还强烈冲击了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1851 年，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出版了他的《社会静力学》，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使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1857 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尔（1821—1842）在他的《英国文明的历史》一书中指出：“高大的山脉和广阔的平原（如在印度）使人产生一种过渡的幻想和迷信”。“当自然形态较小而变化较多（如在希腊）时，就使人早期发展了理智”。 [7] 可见，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发展演变基本继承了古希腊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传统。

近代地理科学也深受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的影响。地理科学奠基人、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洪堡（1769—1859 年）、李特尔（1779—1859 年）均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观点。如洪堡写道“我要努力证明自然条件对道德和人类命运的经常的、无所不在的影响”；李特尔认为，由于英国位置在众海湾从各方面包围的中央，所以自然地成为海洋的统治者。” [8] 但是，地理学界公认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代表人物还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拉采尔（1844—1904）。他在其代表著作《人类地理学》（1882 年）和《政治地理学》（1897 年）中，完整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他认为“地理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 [9] 他的思想广泛传播，作为理论基础，影响欧美地理学发展长达半个多世纪。

就总体而言，上述这些理论基本上继承和延续了古希腊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重点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的精神、心理等方面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强调地理环境无条件的、绝对的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

而与此相反，在近代欧洲产生了另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流派，就是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具体的地理环境在特定条件下决定一些人文事物的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马克思曾指出：“自然资源可划分为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在文明初期，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 [10] 他还指出：“自然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 [11] 恩格斯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生存的源泉。” [12] 他还指出：“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呢？我认为，

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 [13]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曾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着经济关系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 [14]他还指出：“归根到底，社会制度是由地理环境的作用决定的。” [15]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都毫无保留地主张地理环境决定论。可见，欧洲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有绝对与相对之分。所以，“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不是必然与马克思主义对立。

1911年，拉采尔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1863—1932）在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书中写到：“人是地表的产物，是地球的子民，不仅生于地理，而且大地养育了人类，给人于工作，决定人的思想，让人类面对困难，锻炼机体，增强智慧，例如航海、灌溉等各种问题。同时又暗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大地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不仅深入骨肉，而且浸透到精神之中。” [16]她的“人是地表的产物，是地球的子民”、“让人类面对困难，锻炼机体，增强智慧”等观点应当说是客观事实或者是积极的，是可取的。

在我国近代，梁启超（1873—1929）、杜亚泉（1873—1933）、李大钊（1889—1927）等人“在追求中西文化差异性的原因时，主要运用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和方法。” [17]

1924年，德国人豪斯霍费尔结合种族优越论，提出生存空间决定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观点以及地缘政治学的“泛区域”理论等，并长期被认为，为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提高理论依据和规划蓝图。然而，根据豪斯霍费尔的“泛区域”理论，苏联是“泛俄区域”的核心，是一个独立的势力范围，不在“泛德区域”范围，不应该是德国侵略的目标。可见，他对纳粹政策的影响的确有限。詹姆斯后来写到：“看来，虽然豪斯霍费尔可能对纳粹政策有一些影响，但他的重要性是过于夸大了。” [18]但由于他所创办的《地缘政治杂志》“成为支持纳粹政策的工具”，使地理环境决定论一度在东西方遭到排斥。有人认为，“也因此，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人们对于将人群划分为若干等级的做法的反感，地理环境决定论终于彻底失去了市场。而且使地理学跟着倒了霉。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美国哈佛、密歇根、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都因此取消了地理系，而且在做出取消决定时几乎未遭到任何反对。” [19]可见，虽然豪斯霍费尔的理論对当时纳粹政策的影响有限，但是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甚至对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地理学后来的命运却直接造成不良影响。

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否定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后的苏联和50—70年代的中国，对待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态度，成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问题。地理环境决定论被全盘否定，并遭到长期批判。现在看来，20世纪30、40年代以后，不论西方还是东方对待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态度是非理性的。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二战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破坏。

严格地讲，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评一直伴随着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伏尔泰（1694—1778）批评到：“孟德斯鸠不能解释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在同一国家里，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 [20]恩格斯曾经批评（绝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指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看到的只有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而根本上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21]这也正是绝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与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本质区别。在总体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整个学术界走向衰落。

然而，澳大利亚地理学家泰勒（1880—1963）可能是二战后第一个部分肯定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1951年，他提出：“世界上天赋优厚的地区可能给人类生活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可能性；但在大约十分之九的地球陆地上自然发出了清晰的警告：这里太干、太冷、太湿、太崎岖不平。任何定居者如果不顾这些自然的限制，就一定会遭受灾难。”他称自己的观点为“科学的决定论。” [22]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开始有条件地肯定地理环境决定论。吴传钧提出：“一定的地理环境只能容纳一定数量的和质量的人及其一定形式的活动” [23]；王恩涌提出：“地理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其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24]；胡兆量指出：“‘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东风这个自然环境是决定性的” [25]；宋正海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 [26]；曹诗图等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27]；白新欢认

为：“对于社会产生而言，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正确的。” [28]很显然，这些理论观点都在客观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人地关系实际。

总之，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人们就已经对人地关系实质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且形成两大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观点：一是绝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包括人的思想性格气质等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地理环境的产物，是地理环境决定的；另一个是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特定地理环境在特定条件下决定人类社会部分甚至全部人文事物的形成发展。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两大流派的争论断断续续持续到现在。

二、两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论点及其比较

从前文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研究回顾中可以归纳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个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两大流派：一是绝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或者说，无条件地理环境决定论，二是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他们的主要论点见表 1。

表 1：两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论点对照表

绝对地理环境决定论	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
希波格拉底：人的性格和智慧是由气候决定的。	《礼记·王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管子》：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向义。
亚里士多德：北方寒冷地区各民族性格是精力充沛、富于热忱；亚洲气候炎热，各民族精神怯懦，热忱不足。	马克思曾指出：“在文明初期，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恩格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
《庄子，山木》：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	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着经济关系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
让·博丹：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	泰勒：“世界上天赋优厚的地区可能给人类生活提供了许多可能性；但在十分之九的地球陆地上没有提供那么多可能性。
孟德斯鸠：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	吴传钧：一定的地理环境只能容纳一定数量的和质量的人及其一定形式的活动。
巴克尔：高大的山脉和广阔的平原使人产生一种过渡的幻想和迷信。当自然形态较小而变化较多时，就使人早期发展了理智。	王恩涌：地理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其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拉采尔：地理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者着人类的命运。	胡兆量：“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东风这个自然环境是决定性的。
豪斯霍费尔：生存空间决定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白新欢：对于社会产生而言，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正确的。

两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区别，见表 2。

表 2：绝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与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比较表

	认识论位置	决定主体	决定对象	决定方式	对人的态度
绝对地理环境决定论	哲学思辨	地理环境作用力	一般事物	直接决定	否定人的能动地位
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	科学认识	地理环境规律	特定事物	互动决定	承认人的能动地位

三、地理环境决定论分析

纵观古今中外各家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争论，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不象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极端的、错误的单一理论。确切地说，地理环境决定论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是由两大流派观点构成的一个理论体系，包括两大流派：一是绝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或者说，无条件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国古代老子、庄子以及古希腊希波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可以认为属此类。他们将人类社会无条件地置于地理环境的绝对统治之下，认为人类社会是地理环境作用的产物；二是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或者说，有条件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具体的地理环境在特定条件下决定一些人文事物的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等属此类。对于这两大流派应当进行深入分析。

（一）绝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必然是地理悲观论。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产生并存在过，甚至现在可能还存在。但它对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而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不是压抑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约束引导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客观的、积极的、科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带有人地“协调”思想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古代蒙古族等拥有环保法律或宗教禁忌的文化群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以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前提的。否则，他们就不制定法规诫戒律了。正因为如此，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并没有妨碍这些社会的发展，反而确保了他们在没有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创造了辉煌的包括游牧文明在内的各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不同文明。“文艺复兴”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欧洲再度占统治地位，但也没有阻碍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完成。可见，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不可能被压制。因此，以“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指责、否定全部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另外，我们还找不到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地理环境决定论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灾难。相反，无数的教训都能够证明，人类社会的很多灾难就是来自于人类藐视自然、否定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

（二）以“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代替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片面的。

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指责是“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而且认为这一观点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全部内容。事实上，除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和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着经济关系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的论断以外，还很少能够找到明确提出“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表述。甚至被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的孟德斯鸠都否认自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29\]](#)有些学者也否认他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30\]](#) [\[31\]](#)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斯大林指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

原因。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起加速或延缓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影响。”[32]但不能因“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观点的错误，就认为全部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

（三）研究地理环境究竟能够决定哪些事情，是地理学的职责，也是开发利用各种不同类型地理环境的主要科学依据。

地理学应当为每一个地区明确指出在特定历史发展时期内在开发利用地理环境方面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如何做，而不能做些什么事情；做任何一件事情必备的条件和配套措施等。这些是地理环境决定的。因此，研究地理环境究竟能够决定哪些事情，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最大现实意义所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精辟地指出：“自然资源可划分为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在文明初期，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10]恩格斯指出：“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13]这些科学论断实际上是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地域性规律问题。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上述科学论断的内在逻辑抽象为下列“公式”：“特定地理环境对特定时期的特定人文事物起决定作用”——这一本应是地理学的“公式”，地理学至今没有很好地接受与运用，并传承发展下来。这虽然主要是特定历史环境造成的，但不能不说是地理学的一大“憾事”。

四、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

地理环境所能够决定的事物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一）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社会的生存。

人类是从地理环境中逐渐演化而来。马克思曾说：“热带是人类的摇篮”。也就是说，人类还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中产生的。没有人类社会，地理环境可以“存在”。相反，如果没有地理环境，人类社会一刻也不能存在。更确切地说，如果地球生态系统崩溃，人类必将灭亡。因此，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如同胎儿与母亲的关系。首先，地理环境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它的意义与影响极其深远。恩格斯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生存的源泉。……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居住的地方。土地本身，无论它的耕作、它的实际占有会有多大障碍，也并不妨碍把它当作活的个体的无机自然当作他的工作场所，当作主体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33]其次，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空气、淡水、食物以及其他一切生活物质都是地理环境的有机正常部分。最后，地理环境通过大气层在保护人类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本质上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和胎儿与母亲的关系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由于无知、贪婪以及强大的能量，人类这个“胎儿”常常伤害“母亲”，从而直接危及自己的生存，甚至毁灭自己。美洲的玛雅文明与我国古代楼兰文明的消失就是最好的证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地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与内容都在发生变化，但是只有人类向地理环境索取的这种关系永远变不了。所以，可以认为胎儿与母亲的关系就是人地关系的实质。

至于人类主观能动性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永远就像孙悟空与如来佛“手掌”的关系。不管发展到何等高的水平，人类社会永远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她的主宰者。在人类已具有顷刻间毁灭地球几十次能力的情况下，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并且永远牢记人地之间胎儿与母亲的关系。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最高境界应当是成功利用地理环境系统的良性运行规律，而永远不可能以自己的意志征服地理环境。

（二）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对待地理环境行为的公正奖惩“制度”，是地理环境决定的。

如果人类尊重地理环境的特点，并遵循其规律，她会慷慨地“奖赏”。如在蒙古高原，通过游牧生产方式，适度放牧，草原会为人类提供享不完的牧草资源；如果开垦或掠夺性经营草原，她会

让你沦落为“生态难民”。蒙古族牧民的传统人地观中，这一意识极强。因此，他们既敬畏于地理环境，又“感恩”于地理环境。所以，为了保护草原生态系统，几千来他们情愿过艰苦的游牧生活。

（三）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居住在其上的人群的文化特性。

马克思指出：“在文化的初期，不同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生产资料 and 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 [34]如，平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内陆高原的游牧文化、森林山地的狩猎文化、人工环境的都市文化等都是特定地理环境的特定产物。钱穆写到：“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 [35]

在特定地区，有些产业的生产特点以及布局是地理环境决定的。就总体而言，原生态第一产业的生产特点及其布局是地理环境决定的。如草原畜牧业布局在自然条件恶劣的高原地区，并实行游牧生产方式。如果要强行改变游牧生产为“定牧”，甚至开垦草原，发展农业，就必然导致牧区人地关系的全面恶化。内蒙古草原几千来的大规模沙漠化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干旱高原地区特定地理环境决定的。

（四）不同国家、地区或民族的主流人地观不同是地理环境决定的。

如农耕民族更多走的是“人定胜天”的路，而游牧民族更多坚信地理环境决定论。近代欧洲德、法、英三大国的主流人地观极具地域差异性。而且这一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差异基本一致。如，在这三大国中，德国的地理环境最为不利。马克思说：“德国地处内陆地带，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沿海国家。” [36]因此，德国产生地理环境决定论并占统治地位；而法国的地理环境最适宜，产生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可能论并成为主流人地观。虽然英国的地理环境状况居中，而深受法国可能论思想影响的罗士培竟然能够提出适应论。 [37]这不应该是偶然的。

综上所述，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科学地揭示了客观存在的人地关系实质，是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共同智慧的结晶。这或许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生命力所在。几千年来，人类始终“忘”不掉它。然而，由于人类有时不分青红皂白地“错怪”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天全人类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首先应当协调好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那么，确立相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科学地位是协调好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地理学获得彻底“解放”、健康发展的前提。

参考文献

- [1] 宋保平. 人地关系论 [A]. 张小林等编著. 人文地理学导论 [C]. 北京: 测绘出版社, 1995.
- [2]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30.
- [3] 袁清林. 先秦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 [J]. 中国科技史料, 1985, (1).
- [4] 宋正海.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发生发展及其在近现代引起的误解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1, (9).
- [5] 让·博丹. 论国家 [M]. 第五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6] [法]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7]、[8] 引自左大康主编. 现代地理学辞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28.
- [9] [德] 拉采尔. 人类地理学 [M].

- [10] 马克思. 资本论[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 第 2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60. \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 46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6.
- [12] 恩格斯. 经济学手稿[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 第 19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4.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 2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60.
- [14] 列宁全集[M]. 第 3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459.
- [15] 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1. 195.
- [16] 辛普尔. 地理环境的影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7. 1.
- [17] 冯天瑜. 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N]. 文汇报, 1988-11-7.
- [18] [美] 普雷斯顿. 詹姆斯著, 李旭旦译. 地理学思想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226.
- [19] 卢周来. 穷人经济学[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82.
- [20]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M]. 第二卷, 北京: 三联书店, 1961.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 2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574.
- [22] [美] 普雷斯顿. 詹姆斯著, 李旭旦译. 地理学思想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02-303.
- [23] 吴传钧. 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J]. 经济地理, 1991, (3).
- [24] 王恩涌. “人地关系”的思想——从“环境决定论”到“和谐”[J]. 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92, (1).
- [25] 胡兆量. 人地关系发展规律[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1996, (1).
- [26] 宋正海. 应该公正地评价地理环境决定论[J]. 中国环境报, 1994, (3).
- [27] 曹诗图等. 正确认识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J]. 人文地理, 1989, (2).
- [28] 白新欢. 地理环境决定论新论[J]. 天府新论, 2003, (2).
- [29]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序.
- [30] [美] 普雷斯顿. 詹姆斯著, 李旭旦译. 地理学思想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128.
- [31] 曹诗图. 孟德斯鸠并非地理环境决定论者[J]. 科学学研究, 2000, (4).
- [32] 斯大林文集 1934—1952[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16-217.
- [33] 恩格斯. 经济学手稿[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 第 46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44、472、476.
- [34] 廖楚平. 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若干问题的再认识[J]. 湖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98, (3);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一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355.
- [35]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前言,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 46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561.
- [37] [英] 罗士培, 吴传钧译. 人文地理学的领域和宗旨[J]. 外国人文地理, 1986, (2).

Relative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uman Survival Environment Deterioration

Haisan

(The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of Th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uhot, Inner Mongolia ,010022,)

Abstract: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and form the idea that called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in fact it is that an absolute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and a relative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constituted theories theory system. The absolute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is the idealistic theory. But relatively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is materialism scientific theory an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of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theoretical system of geographical. Establishing relative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emise to set up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construct the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and develop geography in a healthy way.

Keywords: Man-land relationship;Relative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Geography;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 2009-04-20;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4BJY058);

作者简介: 海山 (1959—), 男, 蒙古族,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人, 理学博士,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人文地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与规划工作, 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学术研究成果 50 余部篇。